

# 财政透明度会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吗?

郝晓薇<sup>1</sup>, 杨帆<sup>1,2</sup>, 王文甫<sup>3</sup>

(1. 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2. 西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3.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4)

**摘要:**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用有序多项模型研究财政透明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发挥了中介效应,但对于低收入或低学历样本该影响不显著。因此,提高财政透明度,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是增强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公共服务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2)06-0041-10

## Will Fiscal Transparency Improve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HAO Xiaowei<sup>1</sup>, YANG Fan<sup>1,2</sup>, WANG Wenfu<sup>3</sup>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5, this paper uses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scal transpar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and the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played an intermediary effect, but for low-income families and low education group, fiscal transpar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are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Key words:** fiscal transparency; residents' tax compliance willingness;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2035年要实现的远景目标之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则是财政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因此深化现代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持续提

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另外,在2021年党的百年诞辰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并多次强调了对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视和推进,而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有助于更好实现这一新阶段宏伟目标。税收征

收稿日期:2021-12-24 修回日期:2022-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量、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18BJL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规划基金项目“税收驱动小微企业内生发展的实证研究与政策设计”(20XJA790004)。

**作者简介:**郝晓薇(1979—),女,河北定州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管理、财税理论与政策。通信作者:王文甫。

管体制完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提升。目前,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较低,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率高达 50% 以上<sup>[1-2]</sup>。在大规模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与支出刚性并存的现实情况下,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困难程度。长此以往,终将有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顺利达成。因此,探寻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较低的原因,寻求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增强的有效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因素是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设,纳税人天然存在纳税不遵从的动机。然而,在当前政府与社会成员通过互动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追求共同富裕的现实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以公民身份参与到包括税收征纳在内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时,纳税人将不再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将关注税收制度的形成过程、社会效应和政府部门行为方式。由此,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财政支出的透明程度及效率也会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sup>[3-4]</sup>。在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政务公开、透明有助于社会成员及时了解政府收支的来源及去向等信息,方便社会成员对政府收支行为进行监督,有利于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在一个规范性较强的社会中,纳税人更倾向于采取纳税遵从决策<sup>[5]</sup>。然而,我国财政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不高。依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布的《2019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 290 个地级市政府和 4 个直辖市政府中,财政透明程度得分占总分值比重超过 60% 的城市有 118 个,占比 40.14%,这表明我国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因此,较低的财政透明程度可能是造成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较低的原因之一。从财政透明程度的视角考察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因素,探寻提高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有效途径,是

有助于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目前,研究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涉及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三大方面,但尚未有文献利用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利用微观数据就财政透明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厘清了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财政透明度与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微观证据;第二,本文所有数据(包括财政透明度数据)均来自于同一微观调查数据库,可以避免以往研究中将宏观数据与微观调查数据对接而导致的偏差<sup>①</sup>。

鉴于此,本文基于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sup>②</sup>,利用有序多项模型(Ordered Probit)研究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本文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命题提出;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包括变量描述性统计,基准结果,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与异质性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命题提出

### (一)文献综述

以往研究居民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文献从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 3 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从制度角度,可以分为税收与支出两方面。从税收角度,文献主要从税收征管角度展开研究。最早是 Allingham 等(1972)<sup>[6]</sup>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提出了经典的纳税遵从模型——A-S 模型。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加大稽查概率和惩罚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但是,该模型会高估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程度,与现实发生偏离。已有学者研究美国和瑞士纳税遵从问题,结果表

① 解释详见下文变量部分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核心模块、主题模块及附加模块 3 个部分构成,其中核心模块问题每年重复调查,主题模块问题每五年调查一次(问题重复率 80% 以上),附加模块问题不确保重复周期和内容。本文所用微观数据主要来自 2015 年的主题模块及附加模块,是目前能取得的最新数据。相关信息详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官网 <http://cgss.ruc.edu.cn/info/1014/1015.htm>。

明,即使政府的税务稽查率和逃税罚款率都较低,大多数纳税人也会选择依法纳税<sup>[7-8]</sup>。赵永辉等(2014)<sup>[9]</sup>通过税收模拟实验发现,税收执法查获率对高收入个人纳税遵从度具有显著的威慑作用。除税务稽查和罚款等威慑性措施外,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友好劝说可以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sup>[10]</sup>。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除税收征管外,税制公平也会显著影响纳税遵从行为<sup>[11-12]</sup>。此外,一些学者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因素。研究表明,当居民可以影响到政府公共品供给过程或者财政支出效率提高时,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就会增强<sup>[13-14]</sup>。第二,从社会文化角度,已有学者研究发现文化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环境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sup>[15-16]</sup>。第三,从个人角度,已有众多文献研究了如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念、道德认知等主客观因素对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sup>[17-18]</sup>。

财政透明度即财政政策意向、财政预测等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sup>[19]</sup>,反映政府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量化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清华大学自2011年起每年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和上海财经大学2009—2018年连续十年发布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报告》,诸多相关学术研究以上述报告作为直接数据来源<sup>[20-22]</sup>。关于财政透明度影响的研究十分丰富,不管是作为解释变量还是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关实证研究均是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量化和分析。而本文是从微观视角借助微观数据调查衡量财政透明度,与宏观视角的既有文献对其量化的方法完全不同,因此不再进一步展开。

截至目前,虽然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影响居民纳税遵从的因素,但是,鲜有文献研究财政透明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黄立新(2013)<sup>[3]</sup>认为,财政收支信息的不透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预算软约束的现象都可能迫使民生领域财政资金的短缺,而民生是最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领域,纳税人对此感知能力较强,从而导致纳税人主动纳税意愿不高。谷成等(2018)<sup>[4]</sup>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角度认为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可以增加政府

支出效率,从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水平。但该文献也仅限于理论上的阐述,缺乏实证分析。余英等(2020)<sup>[23]</sup>利用省级财政透明度面板数据,基于个税劳务报酬视角考察了财政透明程度对个人所得税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该文献基于宏观数据,采用税收能力法估算个人所得税纳税遵从度,并且缺乏对影响机制的探讨。

综上所述,回顾国内外居民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文献可知,目前尚未有文献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并探寻影响机制。本文采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微观数据,研究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并深入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这对提升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提高国家税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二)研究命题提出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交由代理人打理,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获取更多收益。在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是代理人,社会公众是委托人。社会公众缴纳税收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以解决私人供给公共产品无效的问题。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往往比作为委托人的公民拥有更多信息。并且在现实中,政府由政治家和官员组成,官员的基本动机也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sup>[24]</sup>。因此,由具有这种动机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也将具有该主体特有的利益追求,并非完全按照委托人意愿行事,甚至可能会出于自身私利而损害委托人利益。

当委托人利益受损,便会改变自身行为决策。一方面,委托人会要求政府公开财政资金来源与去向,以便对政府收支行为进行监督约束,防止政府内部出现腐败,个别官员为谋取私利,将税款移作他用的现象;另一方面,委托人容易对政府产生负面看法,质疑政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积极配合政府有关政策落实,甚至降低自身纳税遵从意愿,不再积极主动申报纳税。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高财政透明程度是一种明智的做法。随着财政透明程度的提高,社会公

众可以清晰了解每一项政府收支活动,此时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才能实现对代理人政府的有效监督。一方面,政府收支信息更加透明会降低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信息可以更加公开、透明的传递给居民,居民反馈信息也可以及时传递给政府,从而使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更加符合居民意愿,有利于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以便更好满足居民偏好。当居民能够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中获得切实好处,便会增强自身纳税遵从意愿<sup>[25]</sup>。另一方面,财政信息更加透明可以加强公众对政府收支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当居民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影响政府收支决策时,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会有所增强<sup>[7]</sup>。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命题 H1:

H1:控制其他因素不变,提高财政透明程度,将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此外,虽然总体来看,财政更加公开透明可以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但是对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影响可能存在差异。第一,从收入来看,不同的收入意味着纳税人具有不同的税收负担能力,对应的纳税遵从意愿也会有所不同<sup>[18]</sup>。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税收负担能力强,在满足自身物质文化需要之后,可能会因财政透明程度的提高增强自身纳税遵从意愿。但对于低收入者而言,在自身物质文化需要尚且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即使感受到政府财政透明程度的提高,也难以在有限的收入条件下增强自身纳税遵从意愿;第二,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因为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接受的教育时间更长,除了关心自身利益之外,可能会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更希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以更好地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此时政府财政信息更加透明便为高学历者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当高学历者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时,便有可能增强自身纳税遵从意愿。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命题 H2、命题 H3:

H2:与低收入者相比,财政透明程度对高收入者纳税遵从意愿影响更大。

H3:与低学历者相比,财政透明程度对高学历者纳税遵从意愿影响更大。

后文将对上述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 二、数据来源、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一)数据来源

本文全部数据来自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始于 2003 年,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全面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目前,CGSS 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被众多学者所使用。CGSS 在全国抽样时分为必选层与抽选层。其中,必选层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 5 座大城市作为初级单元,在每个初级单元的市辖区内抽取 40 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 2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 25 户家庭。抽选层是在除必选层 5 座城市市辖区以外的区、县级市、县中抽取 100 个区县,每个区县中抽取 4 个村委会或居委会,每个村委会或居委会抽样 25 户家庭。

2015 年 CGSS 数据覆盖全国 28 个省级行政区划(不包括新疆、西藏、海南)的 478 个村居,有效问卷共 10968 份。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如对各问题回答“不知道”“无法回答”“拒绝回答”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数为 1952 个。

### (二)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有序虚拟变量,按照惯例,本文选择 Ordered Probit 模型讨论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考虑到地区因素可能会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设定中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

$$taxcomp_i = \alpha_1 + \beta_1 transparent_i + \lambda_1 X_i + prov_i + \mu_{1i} \quad (1)$$

在式(1)中,下标  $i$  表示个体,  $taxcomp_i$  表示居民纳税遵从意愿,  $transparent_i$  表示财政透明程度,  $X_i$  表示控制变量,  $prov_i$  表示省份虚拟变量,  $\mu_{1i}$  表示随机扰动项。

### (三)变量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即居民积极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主观心态。借鉴宋

丽颖等(2020)<sup>[18]</sup>、汪冲等(2013)<sup>[26]</sup>的做法,本文选取问卷中“您认为在当前我国个人收入不申报纳税的情况是否经常发生?”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衡量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指标。出于分析直观的考虑,本文对原数值进行了调整,依次将问卷中的回答选项“经常”“有时”“偶尔”“很少”和“没有”赋值为1、2、3、4、5,表示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从低到高分5个档次。

## 2. 主要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财政透明程度,即向公众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结构与功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户与财政收支信息等<sup>[19,27]</sup>。目前涉及财政透明程度的文献大多采用3种数据来源:一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最早于2009年公布的省级《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sup>[28-29]</sup>;二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11年公布的地市级《中国市级财政透明度研究》<sup>[30-31]</sup>;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公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主要对象包括国务院所属的相关部门,省级政府和国内较大城市。尚未有文献利用微观调查数据作为财政透明程度的衡量指标。然而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属于主观变量,一般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依靠居民对税收制度的心理感受进行打分,依据分值衡量纳税遵从意愿的强弱。

如果采用上述3种来源的财政透明程度数据与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相匹配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因为微观调查数据抽样问题<sup>①</sup>而产生偏差。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微观个体调查数据,无法很好代表各省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总体情况,因此本文并未选用这3个团队公布的数据,而是选用CGSS 2015问卷中“如果

只通过正式渠道,您了解地方政府财政经费的收支情况难易程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衡量指标。问卷中该问题的回答选项为“非常困难”“比较困难”“一般”“比较容易”和“非常容易”,数值依次为1、2、3、4、5,表示财政透明程度从低到高分5个档次。这一问题属于CGSS问卷中的法制模块,旨在衡量我国居民对当前法制效果的评价<sup>[18]</sup>。依据财政透明程度的定义,社会公众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情况的困难程度与政府财政收支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成反向关系。因此,本文选取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财政透明程度的衡量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 3. 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大量控制变量。包括居民个人的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身体健康水平、户口、工作性质、社会保障项目、婚姻、家庭成员数量、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家庭拥有房产数量、18岁以下子女数量、社会治理水平、法治水平、政府公信力以及社会是否公平共19个控制变量,涵盖了与居民相关的个人、家庭及社会三方面因素。

## 三、实证结果

###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均值为2.489,中位数为2.000,表明我国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较低,标准差为1.094,表明不同个体间纳税遵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财政透明程度均值为2.012,中位数为2.000,表明我国居民通过正式渠道获取政府收支信息较为困难,财政透明程度较低。

① CGSS 2015只公布了各样本所在的省份信息,但是抽样并非基于各省份进行抽样,而是基于城市抽样。在10968个总样本中,样本数量最多的为湖北省,共600个样本,而样本数量最少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仅94个样本,不同省份间样本数量差异巨大。由于一些省份样本量很少,对该省份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虽然个体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也会受到省级财政透明程度的影响,但是相比于全省财政透明程度而言,居民更关心自己所在辖区内地方政府财政透明程度状况,因为其所在辖区的地方政府承担了本辖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因此,来自微观数据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更多地受其所在辖区财政透明程度的影响。如果用各省份财政透明程度与微观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数据相匹配进行回归,将会导致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抽样导致的个体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与省级财政透明程度不相匹配;二是无法识别出不同城市居民个人纳税遵从意愿受财政透明程度的影响。如甲和乙两个个体分别在同一个省份的A和B两座城市,二者都会受到该省份财政透明程度影响。但是A市和B市的财政透明程度不同,若选用省级财政透明程度,将忽略市与市之间的差异。综上所述,若选用每个个体对财政透明程度的主观感受作为衡量财政透明程度的指标则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变量名称               | 变量定义及描述                                                                             | 中位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i>taxcomp</i>     | 居民纳税遵从意愿<br>经常 = 1; 有时 = 2; 偶尔 = 3; 很少 = 4; 没有 = 5                                  | 2.000  | 2.489 | 1.094 | 1.000  | 5.000  |
| <i>transparent</i> | 财政透明程度<br>非常困难 = 1; 比较困难 = 2; 一般 = 3; 比较容易 = 4; 非常容易 = 5                            | 2.000  | 2.012 | 0.864 | 1.000  | 5.000  |
| <i>gender</i>      | 性别<br>男 = 0; 女 = 1                                                                  | 1.000  | 0.526 | 0.499 | 0.000  | 1.000  |
| <i>Age</i>         | 年龄<br>2015 - 出生年份 + 1                                                               | 52.000 | 53.10 | 15.25 | 19.000 | 95.000 |
| <i>nation</i>      | 民族<br>少数民族 = 1; 汉族 = 0                                                              | 0.000  | 0.073 | 0.260 | 0.000  | 1.000  |
| <i>Faith</i>       | 宗教信仰<br>无 = 1; 有 = 0                                                                | 1.000  | 0.891 | 0.311 | 0.000  | 1.000  |
| <i>Edu</i>         | 受教育程度<br>未接受教育 = 0; 小学或私塾 = 6; 初中 = 9; 高中或中专或技校 = 12; 专科 = 15; 本科 = 16; 研究生及以上 = 19 | 9.000  | 8.624 | 4.426 | 0.000  | 19.000 |
| <i>party</i>       | 政治面貌<br>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共青团员 = 1; 其余 = 0                                                  | 0.000  | 0.140 | 0.347 | 0.000  | 1.000  |
| <i>healthy</i>     | 身体健康状况<br>很不健康 = 1; 比较不健康 = 2; 一般 = 3; 比较健康 = 4; 很健康 = 5                            | 4.000  | 3.628 | 1.048 | 1.000  | 5.000  |
| <i>residence</i>   | 户口<br>城市 = 1; 农村 = 0                                                                | 1.000  | 0.597 | 0.491 | 0.000  | 1.000  |
| <i>work</i>        | 工作性质<br>从事非农工作 = 1; 否则 = 0                                                          | 0.000  | 0.381 | 0.486 | 0.000  | 1.000  |
| <i>insurance</i>   | 社会保障项目<br>参加一项 + 1, 总共四项                                                            | 2.000  | 1.806 | 0.749 | 0.000  | 4.000  |
| <i>marry</i>       | 婚姻<br>同居、有配偶 = 1; 否则 = 0                                                            | 1.000  | 0.867 | 0.339 | 0.000  | 1.000  |
| <i>num</i>         | 家庭成员数量                                                                              | 3.000  | 2.958 | 1.400 | 1.000  | 11.000 |
| <i>inc</i>         | 家庭相对收入水平<br>远低于平均水平 = 1; 低于 = 2; 平均 = 3; 高于 = 4; 远高于 = 5                            | 3.000  | 2.691 | 0.692 | 1.000  | 5.000  |
| <i>asset</i>       | 家庭拥有房产数量                                                                            | 1.000  | 1.120 | 0.597 | 0.000  | 8.000  |
| <i>child</i>       |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                                                                          | 0.000  | 0.493 | 0.748 | 0.000  | 5.000  |
| <i>govern</i>      | 社会治理水平<br>非常低 = 1; 比较低 = 2; 一般 = 3; 比较高 = 4; 非常高 = 5                                | 3.000  | 3.103 | 0.636 | 1.000  | 5.000  |
| <i>law</i>         | 法治水平<br>总是于法无依 = 1; 通常于法无依 = 2; 一般 = 3; 通常于法有依 = 4; 总是于法有依 = 5                      | 4.000  | 3.525 | 0.832 | 1.000  | 5.000  |
| <i>power</i>       | 政府公信力<br>完全不相信 = 1; 比较不相信 = 2; 无所谓相不相信 = 3; 比较相信 = 4; 完全相信 = 5                      | 4.000  | 3.464 | 0.936 | 1.000  | 5.000  |
| <i>fair</i>        | 社会是否公平<br>完全不公平 = 1; 比较不公平 = 2;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 3; 比较公平 = 4; 完全公平 = 5               | 4.000  | 3.241 | 1.004 | 1.000  | 5.000  |

## (二) Oprobit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的第(1)列汇报了各解释变量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影响的 Oprobit 回归结果,第(2)列到第(6)列汇报了各解释变量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边际概率影响(即边际效应)。根据第(1)列可以看出,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命题 H1。在控制变量中,社会治理水平、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是因为当社会更加公平、法制

更加健全、政府公信力更高时,社会法制监督更为严格,公众更加信任政府,更愿意缴纳税收。而受教育程度会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产生显著负影响,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越高,从而具备更广的税收信息获取渠道和更高的逃税能力。根据第(2)列到第(6)列可以看出,财政透明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会使得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经常”“有时”的概率分别降低 1.7%、0.8%,而使得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偶尔”“很少”“没有”的概率分别提升 0.7%、1.3%、0.5%。

表2 Oprobit 回归结果及边际效应

| 变量                 | Oprobit               | 边际效应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i>transparent</i> | 0.067 **<br>(0.030)   | -0.017 **<br>(0.008)  | -0.008 **<br>(0.003)  | 0.007 **<br>(0.003)   | 0.013 **<br>(0.006)   | 0.005 **<br>(0.002)   |
| <i>gender</i>      | -0.042<br>(0.052)     | 0.011<br>(0.013)      | 0.005<br>(0.006)      | -0.004<br>(0.005)     | -0.008<br>(0.010)     | -0.003<br>(0.004)     |
| <i>age</i>         | -0.001<br>(0.003)     | 0.000<br>(0.001)      | 0.000<br>(0.000)      | -0.000<br>(0.000)     | -0.000<br>(0.000)     | -0.000<br>(0.000)     |
| <i>nation</i>      | 0.167<br>(0.115)      | -0.040<br>(0.026)     | -0.019<br>(0.013)     | 0.017<br>(0.012)      | 0.032<br>(0.022)      | 0.013<br>(0.009)      |
| <i>faith</i>       | -0.000<br>(0.08)      | 0.000<br>(0.022)      | 0.000<br>(0.010)      | -0.000<br>(0.009)     | -0.000<br>(0.016)     | -0.000<br>(0.007)     |
| <i>edu</i>         | -0.022 ***<br>(0.008) | 0.006 ***<br>(0.002)  | 0.002 ***<br>(0.001)  | -0.002 ***<br>(0.001) | -0.004 ***<br>(0.002) | -0.002 ***<br>(0.001) |
| <i>party</i>       | 0.015<br>(0.082)      | -0.004<br>(0.021)     | -0.002<br>(0.009)     | 0.002<br>(0.009)      | 0.003<br>(0.016)      | 0.001<br>(0.006)      |
| <i>healthy</i>     | -0.029<br>(0.028)     | 0.008<br>(0.007)      | 0.003<br>(0.003)      | -0.003<br>(0.003)     | -0.006<br>(0.005)     | -0.002<br>(0.002)     |
| <i>residence</i>   | -0.081<br>(0.061)     | 0.021<br>(0.016)      | 0.009<br>(0.007)      | -0.008<br>(0.006)     | -0.015<br>(0.012)     | -0.006<br>(0.005)     |
| <i>work</i>        | 0.051<br>(0.062)      | -0.013<br>(0.016)     | -0.006<br>(0.007)     | 0.005<br>(0.006)      | 0.010<br>(0.012)      | 0.004<br>(0.005)      |
| <i>guarantee</i>   | -0.050<br>(0.035)     | 0.013<br>(0.009)      | 0.006<br>(0.004)      | -0.005<br>(0.004)     | -0.009<br>(0.007)     | -0.004<br>(0.003)     |
| <i>marry</i>       | 0.148 *<br>(0.076)    | -0.040 *<br>(0.022)   | -0.017 *<br>(0.009)   | 0.015 *<br>(0.008)    | 0.028 *<br>(0.014)    | 0.012 *<br>(0.006)    |
| <i>num</i>         | -0.018<br>(0.021)     | 0.005<br>(0.005)      | 0.002<br>(0.002)      | -0.002<br>(0.002)     | -0.003<br>(0.004)     | -0.001<br>(0.002)     |
| <i>inc</i>         | -0.009<br>(0.039)     | 0.002<br>(0.010)      | 0.001<br>(0.004)      | -0.001<br>(0.004)     | -0.002<br>(0.007)     | -0.001<br>(0.003)     |
| <i>asset</i>       | -0.085 *<br>(0.046)   | 0.022 *<br>(0.012)    | 0.010 *<br>(0.005)    | -0.009 *<br>(0.005)   | -0.016 *<br>(0.009)   | -0.007 *<br>(0.004)   |
| <i>child</i>       | 0.013<br>(0.042)      | -0.003<br>(0.011)     | -0.001<br>(0.005)     | 0.001<br>(0.004)      | 0.002<br>(0.008)      | 0.001<br>(0.003)      |
| <i>govern</i>      | 0.219 ***<br>(0.045)  | -0.057 ***<br>(0.012) | -0.025 ***<br>(0.005) | 0.023 ***<br>(0.005)  | 0.041 ***<br>(0.009)  | 0.017 ***<br>(0.004)  |
| <i>law</i>         | 0.031<br>(0.032)      | -0.008<br>(0.008)     | -0.004<br>(0.004)     | 0.003<br>(0.003)      | 0.006<br>(0.006)      | 0.002<br>(0.003)      |
| <i>power</i>       | 0.106 ***<br>(0.028)  | -0.027 ***<br>(0.007) | -0.012 ***<br>(0.003) | 0.011 ***<br>(0.003)  | 0.020 ***<br>(0.005)  | 0.008 ***<br>(0.002)  |
| <i>fair</i>        | 0.088 ***<br>(0.027)  | -0.023 ***<br>(0.007) | -0.010 ***<br>(0.003) | 0.009 ***<br>(0.003)  | 0.017 ***<br>(0.005)  | 0.007 ***<br>(0.002)  |
| 省份虚拟变量             | Y                     | Y                     | Y                     | Y                     | Y                     | Y                     |
| <i>N</i>           | 1952                  | 1952                  | 1952                  | 1952                  | 1952                  | 1952                  |
| Wald $\chi^2$      | 218.63                |                       |                       |                       |                       |                       |
| Pseudo $R^2$       | 0.0374                |                       |                       |                       |                       |                       |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Ologit 模型

考虑到 Oprobit 模型要求变量服从正态分布，但现实中很难满足，为证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要求变量服从 logistic 分布的 Ologit 模型（二者在样本容量足够大时差别不大），结果如表 3 的第(1)列所示，财政透明程度的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再次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 2. 缩尾处理

为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全部解释变量进行了 1% 和 99% 百分位缩尾处理<sup>[32]</sup>，结果如表 3 的第(2)列所示，财政透明程度的符号和显著性依旧未发生改变。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变量                 | OLOGIT              | 1% 缩尾处理             |
|--------------------|---------------------|---------------------|
|                    | (1)                 | (2)                 |
| <i>transparent</i> | 0.111 **<br>(0.030) | 0.073 **<br>(0.030) |
| 控制变量               | Y                   | Y                   |
| 省份虚拟变量             | Y                   | Y                   |
| <i>N</i>           | 1952                | 1952                |
| Wald $\chi^2$      | 216.37              | 218.90              |
| Pseudo $R^2$       | 0.0387              | 0.0371              |

### (四) 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私人供给公共产品无效，需要引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为目标，需要按照公众意愿安排各项财政支出。而财政公开、透明可以帮助公众有效监督政府各项收支活动，从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便更好满足居民偏好，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居民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满意度与纳税遵从意愿有密切关系<sup>[33]</sup>，居民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满意度越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越高<sup>[25]</sup>。因此，本文认为财政透明程度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时，存在中介效应，即财政透明程度提高会增加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而增强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为检验该中介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005）<sup>[34]</sup>、钱雪松等（2015）<sup>[35]</sup>的做法，以公共服务满意度<sup>①</sup>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以下模型进行逐步回归：

$$satisfy_i = \alpha_2 + \beta_2 transparent_i + \lambda_2 X_i + \mu_{2i} \quad (2)$$

$$taxcomp_i = \alpha_3 + \beta_3 transparent_i + \beta_4 satisfy_i + \lambda_3 X_i + \mu_{3i} \quad (3)$$

将式(2)带入式(3)，可得：

$$taxcomp_i = \alpha_3 + \beta_4 \alpha_2 + (\beta_3 + \beta_2 \beta_4) transparent_i + (\beta_4 \lambda_2 + \lambda_3) X_i + \beta_4 \mu_{2i} + \mu_{3i} \quad (4)$$

$$\beta_1 = \beta_3 + \beta_2 \beta_4 \quad (5)$$

式(1)检验财政透明度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总效应，结果如表 4 的第(1)列所示。式(2)

① CGSS 2015 问卷中“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总体上在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衡量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指标。问卷中该问题的回答选项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满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数值依次为 1、2、3、4、5，表示公共服务满意度从低到高分 5 个档次。

检验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如表 4 的第(2)列所示。式(3)检验财政透明程度和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结果如表 4 的第(3)列所示。各系数的关系如式(5)所示, $\beta_1$ 表示财政透明程度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总效应, $\beta_3$ 表示直接效应, $\beta_2\beta_4$ 表示中介效应。由表 4 的第(2)列可以看出,财政透明程度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效应,由表 4 的第(3)列可以看出,财政透明程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均有显著正效应。因此,财政透明程度通过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26.28%  $[0.228 \times 0.086 / (0.055 + 0.228 \times 0.086)]$ 。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变量                 | <i>taxcomp</i><br>(1) | <i>satisfy</i><br>(2) | <i>taxcomp</i><br>(3) |
|--------------------|-----------------------|-----------------------|-----------------------|
| <i>transparent</i> | 0.067 **<br>(0.029)   | 0.228 ***<br>(0.030)  | 0.055 *<br>(0.068)    |
| <i>satisfy</i>     |                       |                       | 0.086 **<br>(0.037)   |
| 控制变量               | Y                     | Y                     | Y                     |
| 省份虚拟变量             | Y                     | Y                     | Y                     |
| <i>N</i>           | 1952                  | 1952                  | 1952                  |
| Wald $\chi^2$      | 218.63                | 538.45                | 220.11                |
| Pseudo $R^2$       | 0.0374                | 0.0641                | 0.0385                |

### (五) 异质性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sup>①</sup>及本研究所提出的实证命题,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与纳税遵从意愿联系密切,为细致研究财政透明度与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内在逻辑,本文分别就这两个因素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

#### 1. 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组

收入不同的人群,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为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高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归入高收入组、低于或等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归入低收入组。分组后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5 的第(1)列、第(2)列所示。对于低收入组,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没有显著

影响。这表明,当家庭收入较低时,即使财政更加公开、透明,居民能够更加方便、及时获取财政收支等信息,但是受制于较低的收入,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依旧不会有所提高。而对于高收入组,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命题 H2。

#### 2. 按照受教育年限分组

按照受教育年限,本文将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设为高学历组,大专以下设为低学历组,结果如表 5 的第(3)列、第(4)列所示。对于低学历组,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高学历组,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验证了命题 H3。相比于低学历人群,高学历人群除了关注自身利益之外,可能会更加关注社会环境变化,更希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过程。此时,财政透明程度的提高为高学历人群监督政府收支行为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当高学历人群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影响政府收支决策时,纳税遵从意愿便会增强。

表 5 异质性分析结果

| 变量                 | 低收入组<br>(1)      | 高收入组<br>(2)         | 低学历组<br>(3)        | 高学历组<br>(4)         |
|--------------------|------------------|---------------------|--------------------|---------------------|
| <i>transparent</i> | 0.025<br>(0.042) | 0.104 **<br>(0.043) | 0.0372<br>(0.0309) | 0.157 **<br>(0.078) |
| 控制变量               | Y                | Y                   | Y                  | Y                   |
| <i>N</i>           | 907              | 901                 | 1686               | 266 <sup>②</sup>    |
| Wald $\chi^2$      | 84.60            | 48.87               | 108.22             | 31.14               |
| Pseudo $R^2$       | 0.0323           | 0.0200              | 0.0237             | 0.036               |

##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本文采用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研究了财政透明程度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影响,并检验了“财政透明程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这一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①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财政透明程度会对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产生正效应。②财政透明程度的提高会通过增加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这一影响机制,

① 参见文献[17]和文献[18]。

② CGSS 2015 问卷采访对象半数以上为农业户口(约 55%)且出生年份普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高学历与低学历两组样本量存在较大差距的客观原因。

进一步提高居民纳税遵从意愿,这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可达 26.28%。③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按照家庭人均收入分样本回归后,财政透明程度对低收入家庭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高收入家庭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则具有显著正影响;按照受教育年限分组后,财政透明程度并未对低学历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对高学历组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却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 (二)政策建议

### 1. 进一步提高我国财政透明程度,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

政府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包括政府机构设置、预算与预算执行情况、重要的财政信息,如三公经费、政府采购、政府性债务、地方投资公司等财政信息,以使社会公众可以及时、准确地分析和评价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收支活动产生的影响。政府应重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公开、透明程度,围绕社会公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科学合理地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项目和标准,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公开,方便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收支来源与去向,监督政府收支行为,对政府行为形成有力的监督与约束。同时,考虑到相关信息的专业性可能对社会公众接收和理解信息带来的认知负荷,还应对专业信息进行适当的通俗化处理,并提供详细且制度化的解释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安排专门工作岗位、制定高效科学的在线反馈制度等。这将有助于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税收的去向、理解税收的价值并激发纳税人自豪感,从而有利于增强纳税遵从意愿。

### 2. 进一步提升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税收是公众支付给政府以换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对价,中介效应证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强化居民纳税遵从意愿。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逻辑上包括规模和效率两大方面,前者要求数量更加充裕,后者要求形式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区域更加公平。这一切首先离不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一步具体到税制结构的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官员

考核直白体系的优化,都可以而且必须强化民生价值。同时,还应切实深化完善公众表达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信息的收集、反馈机制的构建,了解人民的真实诉求并及时获取公众对于本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信息反馈,从源头上有效提高政府掌握公众公共需求的能力。另外,还需格外关注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一方面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优秀的多领域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公众素质和家庭财力也影响着其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准确感知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在教育支持、创新创业等方面提供更加多元和稳定的制度支持应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总而言之,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都指向人民幸福、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而后者不仅是公众的权利同时还是共同的责任,居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提升,是将二者统合起来的一个关键步骤。

### 参考文献:

- [1] 李伟,王少国. 中国各省份个税潜力估算及影响因素分析——综合累进个税改革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15,37(1): 25-31,125.
- [2] 晏华,夏太彪,陈建东. 个人所得税收入流失率抽样调查[J]. 税务研究,2016(11): 48-52.
- [3] 黄立新. 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探究[J]. 税务研究,2013(5): 59-62.
- [4] 谷成,于杨. 税收征管、遵从意愿与现代国家治理[J]. 财经问题研究,2018(9): 99-106.
- [5] FRIDMAN S. Sending them a message: culture, tax coll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South Africa[J]. Policy: issues and actors, 2003, 16(3): 1-17.
- [6] ALLINGHAM M G, SANDMO A.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 (3/4): 323-338.
- [7] ALM J, JACKSON B R, MCKEE M. Fiscal exchange, collective decision institutions, and tax compli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3, 22(3): 285-303.
- [8] FREY S, FELD L P. Deterrence and morale in tax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R].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760, 2002: 1-36.
- [9] 赵永辉,李林木. 威慑机制、遵从激励与面向高收入者的最优税收执法[J]. 当代财经,2014(2): 29-39.

- [10] CHUNG J, TRIVEDI V U. The effect of friendly persuasion and gender on tax compliance behavior[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 47(2): 133-145.
- [11] ADAMS C, WEBLEY P. Small business owners' attitudes on VAT compliance in the UK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1, 22(2): 195-216.
- [12] TRIVEDI V U, SHEHATA M, LYNN B. Impact of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on taxpayer complianc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 47(4): 175-197.
- [13] COWELL F A, GORDON J P. Unwillingness to pay: tax evasion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 36(3): 305-321.
- [14] POMMERHNE W W, HART A, FREY B S. Tax morale, tax evasion and the choi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J]. Public finance, 1994, 49 (Supplement): 52-69.
- [15] 梁俊娇. 纳税遵从意识的影响因素[J]. 税务研究, 2006(1): 71-73.
- [16] 刘珺. 基于心理契约的现代税收文化建设的思考[J]. 宏观经济研究, 2011(12): 84-88.
- [17] 洪连埔. 纳税遵从风险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 2014(3): 93-96.
- [18] 宋丽颖, 张安钦. 公共服务满意度、道德认知与自然人纳税遵从意愿[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 42(6): 50-63.
- [19] KOPITS G, CRAIG J.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M].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ss, 1998.
- [20] 余英, 邹雅芹. 税收遵从与财政透明度——基于个税劳务报酬与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19(8): 64-70.
- [21] 刘俸奇, 储德银, 姜春娜. 财政透明、公共支出结构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J]. 经济学动态, 2021(4): 107-123.
- [22] 王少华, 张宇茹, 陈宋生. 财政透明能助力企业“脱虚向实”吗?——基于稳预期和政企合作的视角[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 24(2): 45-60.
- [23] 余英, 邹雅芹. 税收遵从与财政透明度——基于个税劳务报酬与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19(8): 64-70.
- [24] QIAN Y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83-92.
- [25] FALKINGER J. Tax evasion, consump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fairnes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5, 16(1): 63-72.
- [26] 汪冲, 赵玉民. 社会规范与高收入个人纳税遵从[J]. 财经研究, 2013(12): 6-18.
- [27] 温娟秀, 郑春荣, 曾军平. 中国财政透明度评估(2013)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3(3): 50-57.
- [28] 王永莉, 梁城城, 王吉祥. 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中国微观数据与宏观数据的交叉验证[J]. 现代财经, 2016(1): 43-55.
- [29] 郭月梅, 欧阳洁. 地方政府财政透明、预算软约束与非税收入增长[J]. 财政研究, 2017(7): 73-88.
- [30] 李敬涛, 陈志斌. 财政透明、晋升激励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中国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现代财经, 2015(7): 91-104.
- [31] 黄寿峰, 董一军, 胡乐轩. 税收竞争、财政透明度和非税收入——来自我国市级层面的证据[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4): 117-127.
- [32] 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2(3): 1-15.
- [33] FLED L P, KIRCHGSSNER G. Direct democrac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outcome of economic policy: a report on the Swiss experience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6(2): 287-306.
- [34] 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2): 268-274.
- [35] 钱雪松, 杜立, 马文涛. 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研究: 中介效应和体制内外差异[J]. 管理世界, 2015(11): 11-28, 187.

(本文责编:王延芳)